

从歌乐山到枫林桥



胜利时刻

80周年

山河重光 民族自强

抗战胜利纪念日特刊

本版视觉黄
本期编辑顾
玥 娟

>>> 张安中(时为圣光中学附小学生)

我们从竹片泥巴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楼房里,好似在梦境中一般。我不时拧一下自来水龙头,又按一下电灯开关,有水有电的日子真好啊!



1945年9月3日,重庆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

“回家! 回家!!”

1945年,父亲从英国回到母校上海医学院(当时已内迁重庆)报到并担任教职已有4年了。他和5位年轻人一起,在歌乐山建立了药理实验室,一心想为重庆缺医少药的大量疟疾患者尽一份力。他们专注于研究工作,除了从国外同行寄来的缩微胶卷中得知一些自己科研领域的进展外,对世事了解甚少,但其论文却被发表在国际一流的《科学》和《自然》上,这一切更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,对其他事简直有些不闻不问。8月8日,小组中唯一被大家认为是消息灵通人士的王进英,冲进实验室兴奋地宣布,两天前的8月6日,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!这消息引来极大振奋,大家纷纷议论,这下鬼子要撑不住了,最好再多扔几颗,让它快些完蛋!果然,几天后的一个夜晚,卫生实验院的罗叔叔来我家告诉父亲:8月9日,美国在长崎又扔了一颗原子弹!8月15日天皇宣读诏书正式向中、美、英、苏宣布投降!现在歌乐山顶的广场上正在庆祝呢。我们听了高兴得跳起来,随着罗叔叔往山上奔去,这时山顶广场上已聚集了一大群人,我们也加入了这个又唱又跳的队伍,不时还和大家一起欢呼:“回家啰!”狂欢的人群直到凌晨方散,各自回家睡觉。

接下来是9月3日的重庆庆祝胜利大游行,整个重庆一片欢腾,重庆的“下江人”想的是回家!回家!!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复员、如何离开重庆。生物化学讲师陆明感叹地说:“来重庆已4年多了,住的是竹子泥巴房,睡的是竹篾床,烧的是大灶,用的是大水缸,这些都带不走了,只好拎个箱子回上海,再创业吧。”旁边有人反驳道:“你时光棍一条,现在有三口之家荣归故乡,你还亏啦?”说得陆明也笑了。

首批返沪

上医首批返沪的是朱恒壁院长等人,朱接到教育部紧急通知,携王鹏万副教授飞沪,接受日军的投降交权,收回院产,筹备复员。我母亲因担任院长秘书,也随朱等于9月底回沪。她在动身前夜和父亲一同来到我的小床边,为我拉好被子后,就坐在旁边一条长椅上轻轻地谈话。我知道母亲明天一早要离开我们,而且再也不回重庆来了,心里害怕,睡不着,生怕一觉醒来母亲不见了。我躺着不敢动弹,悄悄听他们说话。在黑暗中听到父亲的声音:“那我和阿中要孤零零在这里至少住到明年9月才能和你团聚了!”母亲说:“你们筹备研究室迁沪要这么长时间啊?不

能再抓紧点吗?”父亲回答:“有一个课题的实验室工作和动物观察还需要5个月才能结束,实验条件不可以中途变换,必须等这些工作完成后才能把摊子拆掉。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是周廷冲,论文应该由他来写。他已主动提出留下,完成课题再走。还有一人自愿留下准备研究室迁沪,你猜是谁?”母亲脱口而出:“王进英。”父亲笑着说:“正是,他不愧是我们的老大哥。遇事总为大家着想。其他3个就可以及时回去了。这4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,复员后他们希望能调在一起工作,做出更大成绩来。这就要看领导的意思了。”母亲叹息道:“我真不知道在你心里,我和我的药理学,哪一个分量更重?”父亲着急地回答:“还有谁的分量能和你比吗?”接着他用平静的口吻说:“你是我此生最爱的人。药理学是我的生命追求。你一直在帮我一点一滴地完成这种追求,知道我有多么幸福和感激吗!”

他俩又轻声谈了许多,我却安心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母亲走了,父亲比过去更忙了。每天早上他还得帮我梳辫子,看我穿戴整齐后才去上班。中午他也要加班,只好带饭去吃,饭匣是我帮他准备的,是米饭、茶叶蛋、酱瓜和一个橘子。晚上他尽量准时回家。这时,每天来为我们买菜做饭、洗衣做清洁的周嫂早已回去了,我把两个人的碗筷饭菜放在桌上,等父亲一回家就好好吃饭,吃饭时我把这一天的所有“大事”都告诉父亲,还发表感想,父亲听得很认真,也发表感想。他也讲一些研究室的事情,譬如动物房里一只叫小花的狗生了3只狗崽,工友老陈特地为小花烧肉汤进补,等等。我听了马上决定明天早上要跟父亲去研究室,然后请老陈带我去看小花和它的狗崽。这些日子我没上学(我本来已进了圣光中学附小住读,暑假里发生了日本投降这样的大事,学校正忙着复员迁校,新学期延缓开学),已经闷得慌了。

一家团聚

父亲的研究室迁沪筹备工作终于完成了!现在轮到我和父亲回上海了!在我们返沪前,发生了两桩惨案:1946年8月,两架自重庆飞沪的飞机相继坠毁,据说是因为飞机太旧了。接着就是上医为将物资运回上海,包了一艘木驳船由轮船拖带到上海,不料到云阳时突然起火燃烧,卒告沉没。虽然人员全部被救,但载运的公私财物损失殆尽。据说因七十多台显微镜沉入江底,上医曾一度开不了课,父亲还写信向海外校友募捐,呼吁帮母校渡过难关;他自己和一些在国内的校友,也抽业余时间兼

职教学,将所得捐给母校。

1946年夏,滞留重庆的上医人员纷纷返沪,不少人侥幸买到船票回了上海,我们没买到,但有幸登上一架军用运输机。没有座位,大家席地而坐,所幸平安抵沪。当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时,大家不由得欢呼:“上海!!”上医派车到机场接我们,母亲从车上下来,看到父亲向她走来,眼泪就出来了。她用埋怨的口气说:“一连坠毁两架飞机,你们还坐飞机回来啊?知道我有多害怕吗!”父亲憨厚地回答:“不是想早点阖家团聚吗?”

搬进新家

我们被上医分配入住市政府路(后改名平江路)外交大楼院内十幢小楼中的第九幢。那里有十幢小楼,分两排,一律朝南,两上两下,带顶层阁楼,门前有一小块由竹篱笆围成的小花园。靠院大门的小楼为1号,由肺科吴绍青教授入住,2号为内科钱教授,3号是生理科的徐丰彦教授,4号为病理科谷镜沂教授,5号是林国豪教授,6号是内科林兆耆教授,7号是五官科王鹏万教授,8号是胸外科黄家骊教授,我家住9号,10号是外科沈克非教授。我们从竹片泥巴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楼房里,好似在梦境中一般。我不时拧一下自来水龙头,又按一下电灯开关,有水有电的日子真好啊!父母亲赶紧把他们父母和我妹妹接来同住,外公已在上海沦陷期间去世,剩下的3位老人总算团圆圆过上了幸福的晚年。

搬入新居,首先缺的是家具,我们的床和桌椅都是公家在接收敌产时分到的家具,随后就借给我们使用,虽然陈旧简陋但还实用,各家都如此,也就不觉寒碜了。那时也有不少侨民离开上海,寄售商店里旧货很多,还比较便宜,母亲去买了许多椅子,还有一架旧钢琴!这使我万分欣喜,从此,我和妹妹就跟着邻居王鹏万医师的夫人学钢琴了。在这之前,我经常隔墙聆听沈克非夫人弹钢琴,不敢相信一向严肃的陈翠贞教授能弹出这么美的音乐来。沈克非当时是中山医院院长,是出名的严师,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,还热爱小动物。每天傍晚他下班后从中山医院走回家时,他家养的一只灰母鸡就急急匆匆奔上前去迎接,一面咯咯地叫,并凑上去接受主人的轻拍爱抚;吃晚饭时,一只猫咪神气活现坐在饭桌上,把沈克非含在嘴边的虾轻轻衔到自己嘴里,它的主人乐得直夸猫咪动作精确是个天才。当时好莱坞电影盛行上海,我们这些初中生都挑一个自己敬佩的演员然后宣布做他(她)的影迷,父母反对我和妹妹去做什么影迷,但沈克非却认为这

也是人生一段经历,他虽然没时间看电影,却选了“多罗西拉莫”,要当她的影迷,还把她的照片贴在床头的墙上,使他的夫人感到十分别扭,幸好照片纸张逐渐蒙灰并泛黄,他家的阿姨就此把它扫除了。

大院人情

我们住的大院内有一片广场,白天有孩子在踢球。晚饭前,大人们会走出家门,站在广场上聊聊天,虽然时间很短,但能简单交流并放松身心。一般5号到10号的人容易相聚,对面一排小楼因距离较远,除了2号里钱教授偶尔找我父亲谈事,其他人很少过来。我们这一排小楼中,8号的黄家骊教授很少出来,当时他正在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(今华山医院)创建胸外科,日夜繁忙,夫人身体虚弱,两个孩子都患严重哮喘,因此他还得管点家务,忙得他神志有点恍惚。一天他来了个客人,热得一头汗,黄家骊教授忙从冰箱里倒了一杯冰水给他。客人喝下一大口,突然皱起眉头说:“这水不对头!”主人赶紧检查,才发现是一瓶DDT溶液错放进冰箱里了,马上送中山医院急救。这事闹得沸沸扬扬,大家都来关心筋疲力尽的黄教授,我妈妈帮黄太太找了个小保姆,帮着做家务并照顾两个孩子,林兆耆教授还来对黄太太的病进行诊治,连吴绍青教授也自告奋勇为两个哮喘孩子设计新的治疗方案,这才把黄家骊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了。从此他偶尔也来参加晚饭前在广场的短暂聚会。其实这个大院里汇集了许多学科的医药专家,有些事不一定要跑医院跑有关单位,广场上相互请教就解决了。我妈对此利用得有些过。我家猫咪喉咙里卡了一根刺,痛苦万状,我妈就抱了它到广场找王鹏万医师求治,等王医师回家找到额镜和钳子又把小猫固定起来就花了近一个小时。刺被顺利拔出,医生的手被小猫抓出一条血痕。妈妈十分感激,请王鹏万夫妇来我们家吃外婆做的酒酿汤圆。王太太当时已是我和妹妹的钢琴老师,两家的关系亲近了不少,只是小猫见了他俩总是没命地逃。

1946年还来了“美国救济总署”,按户分配一些生活用品。我和妹妹都穿上嫌大嫌长的旧呢子大衣,吃压缩饼干,给捐赠这些东西的美国孩子写回信。那段时间,我们的英文长进了不少。

《我的1945——抗战胜利回忆录》《民间影像》(同济大学出版社)

内容支持